

建筑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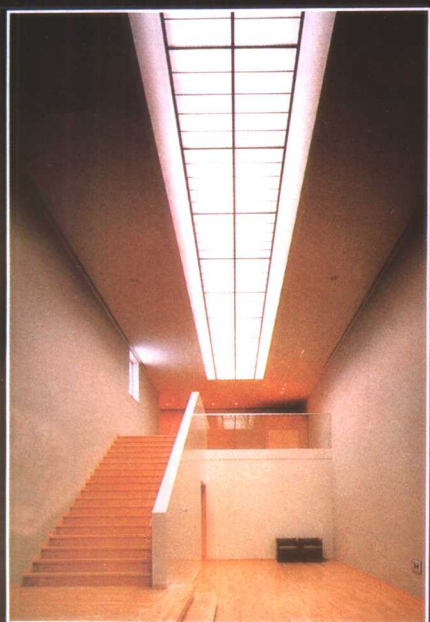


77

19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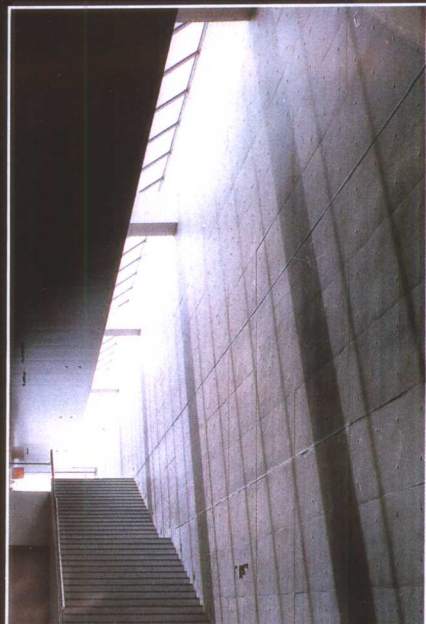
ARCHITECT



长野县信浓美术馆东山魁夷馆



长野县信浓美术馆东山魁夷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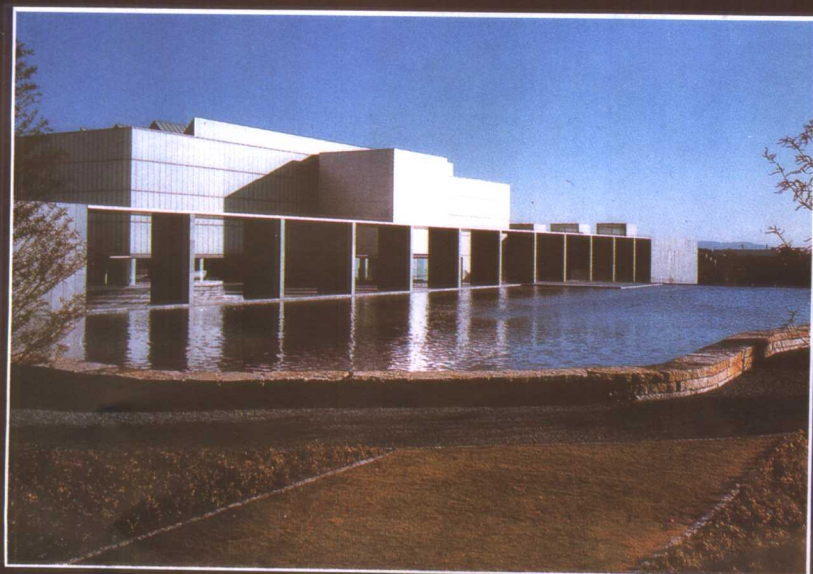
丸龟市现代美术馆、市立图书馆



土门拳纪念馆



丸龟市现代美术馆、市立图书馆



丰田美术馆

程泰宁建筑设计作品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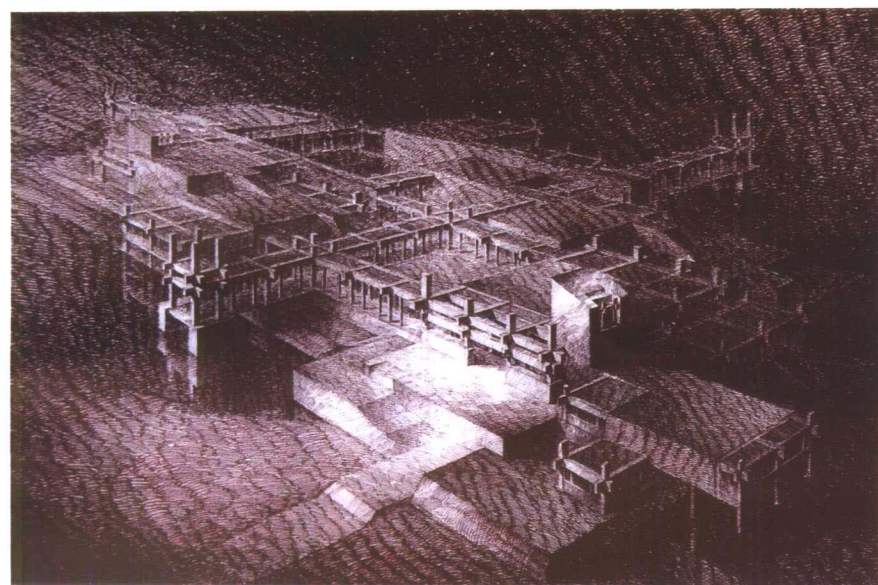
黄龙饭店



黄龙饭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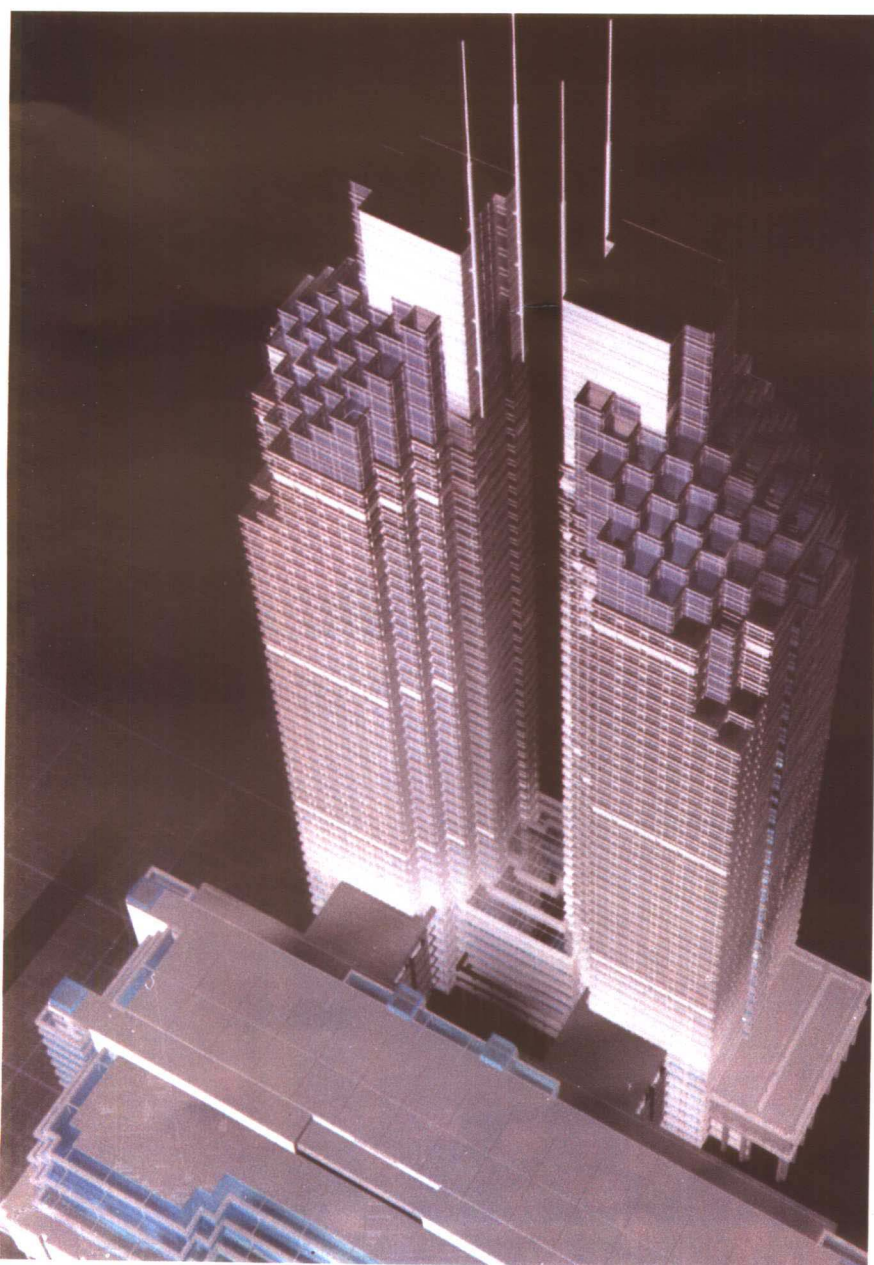
加纳国家剧院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上海银舟大厦



海口商业广场



杭州黑猫大厦

程泰宁建筑设计作品选



杭州铁路新客站



联合国国际小水电中心



马里会议大厦

建筑师

77

ARCHITECT

目录

建筑师

[建筑学术双月刊]

本刊顾问：叶如棠

吴良镛

周干峙

主 编：王伯扬

副 主 编：于志公

王明贤

责任编辑：徐 纺

装帧设计：庄雪敏

编委会

主 任：杨永生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于志公 王伯扬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吴竹涟 孟建民

洪铁城 栗德祥

黄汉民 常 青

彭一刚 谭志民

黎志涛

纪念刘敦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4 履齿苍痕

——缅怀士能的一生

陈 敬□述 刘叙杰执笔

9 难忘的教诲 永远的怀念

——纪念刘敦桢师诞辰一百周年

罗哲文

13 忆士能师

郭湖生

15 重修金陵瞻园记

刘叙杰

建筑设计研究

16 何叹复古 何患折衷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百年校庆纪念碑亭设计

彭一刚

20 便民 谦逊 配角

——曲阜市后作街规划建筑设计

戴复东

建筑设计方案

23 动静结合 兼收并蓄

——上海市“莲浦花苑”住宅小区规划建筑设计

李振宇 郑士寿 张小岗

29 万县市“百安花园”小康住宅示范区

戴志中 朱昌廉 董世勇等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小史

34 明南京(兼论明中都)

郭湖生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筑师》编辑部编辑

(京)新登字 035 号
第77期1997年8月
(逢双月末出版)

封面 吉隆坡国家石油大厦
设计：西萨·佩里设计事务所

摄影：余亦军

建筑理论研究

- 41 迷途未远 来者可追
——为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建筑艺术而深思

唐 璞

- 50 建筑创作中的深刻哲理
——与台湾叶树源先生的书札往来

王国梁

建筑评论

- 55 泰宁尺度
59 “功夫”在设计之外
——张在元与程泰宁对话

张在元

建筑师札记

- 65 北窗杂记 (五十七) (五十八)
73 对“东方明珠”美学的思考
77 建筑组群文化形态的创作构思

翼 武

张秀林

李 云

外国建筑师介绍

- 79 圣莫尼卡学派的建筑实践
99 谷口吉生和他的六个美术馆

沈克宁

梁 雪

译文

- 106 环境绿化与视觉观效果分析

大野隆造著 覃力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7 彩插 2 字数: 320 千字

1997 年 8 月第一版

1997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7,200 册 定价: 18.00 元

ISBN 7-112-03266-0

TU·2509 (8409)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ARCHITECT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建筑师: 77/《建筑师》编辑部编.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7. 8
ISBN 7-112-03266-0

I. 建… II. 建… III. 建筑学—丛刊 IV. TU-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0966 号

[编者按] 今年9月19日是我国杰出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刘敦桢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本刊特发表一组回忆文章，以志纪念。

履 齿 苔 痕

——缅怀士能的一生

陈 敬 □述

刘叙杰 执笔



测绘古建筑（中立者为刘敦桢）

我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学校中的老教授家属，看到学校几十年来的变迁和发展，自然也和大家一样，感到无比的振奋和由衷的高兴。面对过去半个世纪的风雷激荡和地覆天翻的变化，也使我不禁萦回往昔，浮想连翩，许多年来的故人旧事，一时涌上心头，以致竟然不能自己。

回顾自己的大半辈子，都是伴随着已去世的老伴刘敦桢（字士能）在这学校中度过的。也就是说，我的生活、家庭和士能毕生从事的事业，都和学校休戚相关，密不可分。到目前为止，我们这一家已有三代人在这里工作了。除了士能，长子叙杰在建筑研究所，媳宋谊在电力系，孙刘

圻在建筑设计院。我们祖孙一直都将这里看成是自己永久的“家”。

一、日本留学归国以后

往事如烟，犹梦犹幻，而昔日情愫，也常系我怀。

那是在1922年春天，士能从大学毕业后，经过约莫一年实习，就由日本回到上海。这时的旧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和国内军阀相互战乱的混沌状况。对于一个刚自东瀛归来的青年留学生，摆在面前的道路是很多的。是从政，经商，办学，搞技术，还是从事其他工作？旧社会中形形色色的诱惑，在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格外显得突出，许多人为权势、金钱或色相所俘虏而堕落，成为行尸走肉，甚至出卖灵魂。士能则是执着于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应当真正为中国做一些有益的事的信念。先是选择了建筑师的职业，后来又走上教师的道路。

1923年，士能应留日老同学和挚友柳士英的邀请，来到江南的著名水乡城市苏州，执教于当地的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那时，全国各大学还未设置建筑系，这样的专门技术学校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了。当时在一起担任教学工作的，还有柳士英、朱士圭、黄祖森等。他们都为培养中国最早的建筑技术人才，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25年夏，士能从上海回到长沙，受聘于座落在湘江之畔和岳麓山下的湖南大

学土木系，就这样，他第一次正式踏上了高等学府的讲台。次年，又回到苏州工专任课，并继续担任建筑师工作。

苏南太湖一带，自古以来就有“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之称。加以气候宜人，物产丰富，生活条件比其他地区优越。因此，不但人才荟萃，当地的古迹名胜也很多，无论是寺庙、佛塔、道观，还是祠堂、园林和住宅，都可称为东南第一。它们平时大多都对外开放，任凭雅俗共赏。这给从小就十分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士能，提供了极好的观摩学习机会，并为他日后正式开展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二、1927年我校建筑系初创情况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已逐渐崭露头角，但是受到帝国主义者在各方面的压迫和限制；在建筑业方面也是如此。当时为发展经济所兴建的工厂、车站、银行和商业建筑等等，从建筑的设计、施工到材料供应，都必须通过洋人和他们把持的机构。为了振兴中国，摆脱外来的控制和垄断，中国必需有自己的建筑人才。光靠派人到国外留学是不够的，还应当在国内进行培养。于是，在社会的强烈要求和学界元老蔡元培等的支持下，决定在南京的江苏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建筑系——也就是我们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前身。

当时我还没到南京，听士能说建筑系的成立时间是1927年秋，由刘福泰任首届系主任，并招聘了若干自欧、美、日本等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学人任教，又将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筑科的部分教师和全体学生迁来南京。士能是在那年12月率学生由苏州来宁的，当时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国内各大学都改为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则称第四中山大学，后来，又改为中央大学，成为全国最高学府所在。

当时在系中执教的教师，除士能以外，还有留美的刘福泰、卢奉璋担任设计教学；留英的李毅士教授建筑绘画；留法的贝季眉，教什么则忘记了（他的孙子，就是现在在国际建筑界享有盛名的贝聿铭）。因为刚刚建系，所以大家的职称都是副教授。在决定系的培养目标和方向、学制和课程设置方面，也曾经作过多次的讨论和研究，最后才算得到一个比较符合中国国

情实际的方案。此外，又努力筹措经费，设立专业教室，添置图书和教具。士能在这些方面，协助刘福泰作了许多工作。他的学生、已故建筑系教授张镛森在《缅怀刘敦桢老师》一文中另有评介，我这里就不赘述了。

由于刚刚开始，制度还不很健全。有的教师也很随便，因为经商、致仕或寻欢作乐而不能按时上课的绝非一例。士能开始只上中、西建筑史和中国营造法，后来为了替同事帮忙，不但建筑设计和阴影透视，甚至结构和测量都要上。虽然工作很辛苦，但他也因此从中得益不少，特别是对全部课程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方面，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三、师生间融洽无间

随士能由苏州迁来的学生有两个班级，每班只有五六个人，到南京后分别晋入二、三年级。1928年新招的一年级，只有两名学生。一位叫辜其一，另一叫杨大金。虽然我后来才认识他们，可是印象特别深刻。一来是这个班人数最少，二来是他们都是四川人，矮个子，一看就认得出。辜其一后来是重庆建工学院的教授，解放后和我们一直有联系。从1930年起，学生就渐渐多起来，但每班仍不过十人左右，其中也招了少数女生，如于均祥、王蕙英等。

我是在1931年春天到南京的，在鼓楼附近的唱经楼后街租了几间小屋，算是安了个家。由于系比较小，师生人数不多，士能又和大家的关系好，所以我很快也和大家熟悉了。记得当时的助教有四位。一位是刘宝廉，原来是苏州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也是中央大学建筑系第一届毕业生。另一位是张镛森，亦来自苏州工业学校，是建筑系第二届毕业生，和士能关系很密切，也是他得意的学生和助手，在工作上十分相知与默契。第三位是濮济材，是个戴眼镜的南京人。第四位姓孔，名字记不清了。他家境不大好，孩子也多，妻子患伤寒无力医治，我们曾借给他50元钱用以治病。有天他到我们家，盘桓了一整天才走，后来不久忽然听说他因病去世，使我们大吃一惊。原来他妻子虽然病愈，可是病菌传染给他。那时天气很热，士能冒暑为他办理了全部丧事，并把他的家属送回原籍。

学生中的女生，自然比较更容易和我接近。一位是于均祥，因为她是湖南人，所以多了一层同乡关系。她后来和上一班的许道谦结为伉俪。另一位是王蕙英，身材娇小，梳着两条辫子，来自苏州，以后和张镛森成为佳偶。至于男生，印象较深刻的是那一对四川学生——辜其一和杨大金。那时正值四川军阀混战，一时经济来源断绝，士能就为他们交付了学费。另外还有曾子泉和林宜。前者来自长沙，也算是老乡，他经常穿着一袭长袍，似乎还带点乡土气息。后者本是东北大学学生，因“九一八”事变入关，是转学来到中大的。他原籍福建，却不远万里到东北去求学，当时颇为少见，以后方知道他是林徽因（梁思成夫人）的本家。

四、早期的科研活动

士能在中大期间，仍利用假日外出参观古建筑，平时也阅读一些有关的史籍文献。192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佛教对于中国建筑之影响》。1931年又对日本学者滨田耕作《法隆寺与汉、六朝建筑式样之关系》和田边泰《玉虫厨子之建筑价值》作了翻译和补注，都登载在当时唯一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术刊物《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引起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注意。

早在1929年，朱启铃（字桂辛）先生为了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发起并组织了我国第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营造学社。1930年邀请梁思成和士能参加，以后陆续加入的还有陈植、卢树森、童寓等，都是学界俊杰。士能参加这个学术团体后，对古建筑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除了继续收集文史资料，广为踏勘揣度以外，又在南京中山陵东南，按清官式做法建造了一座光化亭。这亭全由石建，平面八角形，重檐攒尖顶，形式仿木结构，梁和天花上都施以彩画图案。这也是他对中国古建筑设计的第一次实践。

1931年夏，士能率助教濮济材、张镛森和部分高班同学（有戴志昂、辜其一、杨大金等）赴曲阜、北平参观古建筑。除了孔庙、故宫、北海、天坛、颐和园以外，还到了十三陵、香山、居庸关和长城。在炎炎夏日之下踏勘古迹，并摄影、测量，这也是国内学人对传统古建筑进行最早的一次科学考察活动。

五、学术上第一个黄金时代

这时朱启铃先生自北平来信再次邀请士能前去作专门的研究工作。我们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放弃南方较优裕的生活条件和工资收入，接受北上的邀请。1932年夏天，我们离开中大，走上人生新的征途。这一决定，对士能的一生同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等到11年后我们再次归来，周围的世界和我们自己，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士能在离开学校以后的这段时期里，在科研工作上是花了大气力的。他和营造学社同仁考察了华北和西南两大地区的古建筑遗址，自己共写出论文报告35篇，约65万字；另外还与社友合写了7篇，约30万字。这使他和梁思成同在中国建筑史学界中，建立了无可争辩的最高学术地位。可以概括地说，这十来年是他学术上形成飞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抗日战争进入中期以后，由于研究经费的来源枯竭和日常生活的困苦，营造学社的研究工作已难以继续进行，而士能的健康状况亦每况愈下。这时，从南京迁到重庆沙坪坝的中大建筑系又来聘请士能返校执教。杨廷宝、童寓等老友也纷纷致函，劝我们暂时换个环境。因此，我们就在1943年的夏天，来到了重庆。

六、担任建筑系主任和工学院院长

重庆当时虽然是内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但我们的生活条件仍非常不好。住所是一座由旧民居改为教工宿舍的大杂院，一共住有12户人家，每家一至二间住房，另在屋后搭个棚当厨房。室内地下非常潮湿，不但经常冒水，黄梅季节还能长出两三寸的白毛。顶上瓦缝可以见天，下雨时常在室内各处放置盆罐接水。饮用的水挑自水塘，不经明矾沉淀不能使用。又时常停电。

士能这时上中、外建筑史课，由于这十来年来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的积累，内容当然已大非昔比了，所以很得到同学的欢迎。第二年，即被任命为系主任。当时各大学实行的是聘任制，每年暑期发下年度的聘书，而教师的流动性也很大，不少是因为他处级别、工资较高而离开的。各系教师都由系主任委命，因此一到暑期将临，不但有的教师内心惶恐，就是系主任

的日子亦不好过。因为一个系好不好，主要看它的教师队伍如何。而能不能聘到或留住高水平的教授，就要看系主任的本领了。当时建筑系的教师阵容相当强大，专职教授有谭垣、徐中、李汝骅和士能，都具有比较丰富的学识和教学经验。兼职的则有杨廷宝、童雋、哈雄文、陆谦受等，都来自知名的建筑师事务所，有着众多的实践经验，就是助教们，如巫敬恒、樊明体、卢绳、叶仲珩等，也都兼具很强的教学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全体教师和学生一致努力下，建筑系的学术和教学质量得到很大提高，达到了建系以来的巅峰状态，因此后来被人们称为“沙坪坝黄金时代”。现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许多建筑师、教授和学者，都是那时毕业的系友。如吴良镛、黄康宇、陈其宽、严星华、朱畅中、张守仪、肖宗谊、陈家壩、王秋华、黄宝瑜等等。

中大当时共有七个学院，其中工学院人数最多，也最活跃。建筑系在工学院中虽然人数顶少，但活动的能量常常超过其他大系，这大概是这个系的一贯传统吧！记得当时系里的学生曾办过一个名为《建筑》的刊物。学生自任编辑，不论是征收稿件，还是抄写油印或装订发行等，都由自己动手。士能也将刚刚写就的文章，抽了两篇登载在这刊物上，以表示对同学热情的支持。校中学生剧团又常公演一些大型话剧，如《雷雨》、《清宫外史》等。舞台布置自然少不了建筑系同学的份，就是剧中演员，也有不少是我系的学生。

由于依靠中大的菲薄工资不能维持家庭最低的生活，士能不得不在重庆大学和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兼一点工作。为此，常要搭乘破旧而拥挤的公共汽车进城。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中大校长吴有训任命士能为工学院院长。在未减免建筑系教学工作和行政职务的情况下，要处理好这个全校最大和重点学院的各种事务，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日寇宣布投降的喜讯传来，全国为之欢腾庆祝。战时迁来后方的机关、学校、工厂和它们的人员，都纷纷作回归的打算，中大自然也要搬回南京。当时主要交通是沿长江顺流而下，但是船少且吨位小，要运送大量设备、图书和人员，不知动了多少脑筋，费了多少力气，花了多少时间。此外，大还乡也造成了一些人员的流动和变化，有的荣归故里，有的另谋高就，个别的还发生了不幸。但是也有好消息，士能从西南联大

（抗战时在云南昆明）延聘了钱钟韩和吴大榕两位名教授来中大，就是他常引为得意的事。

由于要处理各项善后工作，我们差不多是最后才离开沙坪坝的。

士能此时主持学校返回南京后的基建工作。建造了文昌桥的学生食堂和一至七宿舍。参加工程组工作的，有30年代的校友张镛森、王惠英，40年代校友高乃聪、陈干等。

由于校本部面积有限，因此医学院和农学院设在丁家桥，理、工学院的一年级也在那里。当时的工学院有机械、电机、航空、水利、化工、土木、建筑七个系，其中不乏知名教授，除了前面介绍的以外，还有严恺、张书农、陈章、舒光冀、胡乾善、时钧等。当时院、系两级机构都很简单，士能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在今天旧图书馆一楼西首），下面仅设一位秘书，记得他是个办事极其认真负责的老人，名叫杨博文，后来在肃反运动中自杀了。

士能大约是在1947年秋辞去院长职务的，因为我当时长期卧病在床，后来又住医院准备开刀，使他公私不能兼顾，为此，不得不作这样的决定。从这时到解放前夕，社会经济和政治日益动荡，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他的科研活动也处于完全停顿的状态。

七、科研工作的鼎盛时期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获得了解放，学校也改名为南京大学。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风气彻底转变，使“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梦想成为现实，对我们都是极为现实和生动的教育，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对于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

由于国家对教育工作的重视，解放后陆续在各地新建了许多学校，1952年又进行了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南京大学工学院独立出来，成立了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和各系一样，教师、学生和教学设备、图书，都有很大的发展。在科研方面，建筑系和华东建筑设计院合办一个建筑研究室，由士能任主任。随即开展了对各地民居，以后又转向传统园林的调查研究。在这些方面开展规模较大而又较系统的科研活动，在当时国内可算首屈一指的了。而且对国内建筑史学界（包括设计单位、科

研机构和大专院校等)在上述两个领域中的研究,起了开创性的带头作用。

研究民居的调查工作,北至北京,西迄山西,南至广东,但以东南一带的江苏、安徽、浙江、福建诸省的收获较大。特别是皖南徽州的明代住宅和福建崇安的客家土楼最有特色。直到目前,仍引起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和研究。士能1956年写了一本《中国住宅概说》,将几年来研究所得作一概略介绍。

对于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是士能在解放后所进行的第二项重要的科研工作。在经过对南京、扬州、苏州、无锡、杭州等地的园林现状进行普查以后,发现苏州一地的园林,不但数量最多、历史悠久,而且其设计水平和具有的特点都居全国之冠。因此确定了以苏州园林为该项研究的重点。除了对城内外的园林和庭院作了几次全面而详细的调查,又广泛查阅引征史籍和各种文献,以便对其形成与发展有一个综合的了解。1956年在南京工学院的第一次学术报告会上,士能发表了论文《苏州的园林》,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作了分析研究。参加这项科研的除了研究室同志以外,建筑历史教研组的全体教师和系里一些其他同志也都作了长时期的细致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士能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遗稿由他的助手和学生整理,到1979年方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书名《苏州古典园林》。内容取材丰富,图文精辟,深受国内外学界推崇,并认为是研究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经典著作之一。

士能从事的第三项科研工作,是自1958年起至1965年期间,多次参加和主持了由国内本学科专家学者集体编写的中国建筑史。先后出版的有《中国建筑简史》(1962)和《中国古代建筑史》(1980)。都是在系统总结了历史文献,已知的建筑遗物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后者前后历时七年,八易其稿,工作浩繁可以想见。此书于1988年被国家评为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也是全部特等奖中唯一的建筑著作。

以上几项工作,都是在1953年至1965年期间进行的,其间因政治运动而几度暂停,所以实际工作时间较上述期间为短。但它们对中国建筑史这一学科所作出的贡献和产生的影响,都非常突出,也是

这一学科在解放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因此可以说这十几年,是士能一生中另一有决定意义的阶段,也是他自己在科研事业中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八、勤奋、严谨、团结出硕果

国家和党对于他的工作,一贯给以积极的支持和鼓励。在科研经费、机构、人员、时间……等方面,都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而这就是上述科研项目能够取得长足进展的首要原因。其次,全国各有关高校、科研机构、设计单位和其他部门,以及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所给予的无私帮助与通力合作,也是完成这些艰巨工作所必不可缺的。而士能数十年来对本职工作的热爱,以及他的长期勤奋努力和献身精神,都为他在学术上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主观上的基础。就我所知,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过什么业余的嗜好。公余课后,总是一卷在手,或伏案写作,每晚常常工作到深夜才肯休息。长期而过度地用脑和缺乏适当的户外活动,导致他健康状况日差。

士能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现在留下来的讲课教案,每个字都写得整齐端正,政治学习的笔记也是如此。写一篇文章不知要修改多少遍,字字句句都经斟酌。他曾经说过:“好的文章,字字掷地作金石声”。就是写信,大多数先起稿,最后才誊写清楚。他对下面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图画得不够好的必须重画,照片不符合要求的重拍,这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点苛求。但这不仅是为了保证工作质量,更重要的是要在全体人员中树立认真负责的严肃作风。他处处以身作则,不但在工作、学习中,就是生活上也很注意。

在我的记忆中,1945年还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执教的时候,正值女儿叙叙小学毕业,他在纪念册上题词:“宽以待人,严以律己”,这虽是对女儿的教导,也正是他对自己的写照。当时国民党当权,无论大小机关,吹牛拍马的人,比比皆是,士能看不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常常嗤之以鼻,并不屑与之伍。

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人忠诚,有问必答,即使这人是外行,如果向他讨教学术问题,他都很细致地一一作答。在学问上从不吝教,不保守,这是他的优点之一。

(下接12页)

难忘的教诲 永远的怀念

——纪念刘敦桢师诞辰一百周年

罗哲文

古人有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今天我方始信其言之不谬，回想起我考入中国营造学社拜刘敦桢、梁思成等为师学习古建筑已经57年过去了。值今刘敦桢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建筑师》编辑部为出版刘敦桢先生纪念专号，嘱我为文，自是必然奉命的。因为如果没有恩师的教诲，我今天也就没有以古建筑这门知识与技能来从事古建筑保护与研究这一崇高事业的本领。

刘敦桢先生是我学习古建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印象尤为深刻，怀念之情，时刻难忘。值此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择其要者记之，以为纪念，以志不忘。

一、初聆教诲，终身难忘

我记得那是1940年的一个冬天，中国营造学社刚从昆明辗转迁到了四川宜宾李庄（当时李庄属南溪）。为了补充新生力量，在宜宾报纸上刊登了招考练习生的广告，我有幸被录取了。背着简单的行李，来到了中国营造学社报到。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学社的办公地点还在距李庄镇子两三里地的农村中。当我跨进大门之后，许多学社的前辈们对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伙伴都非常关心和照顾，使我感到非常的温暖，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敦桢先生。那时思成先生经常为学社的经费来源等事，远道去重庆奔走，学社的一切事务都由敦桢先生来承担。他首先向我介绍了学社的情况，把学社的历史、工作性质、工作人员等都一一作了简单的介绍，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所说的我们学社是一个纯粹的学术团体，大家都是读书人，做学问的，不是当官的，不是衙门，学社同仁大家都一样，你不要怕。你年纪小，大家都会照顾你的。他还很关怀地说，你没有读过大学不要紧；我们这里是专门从事古建筑的调

查研究工作的，大学里也没有这门课程。我们学社里有不少工作做得很好的先生如莫宗江、陈明达先生比你年纪还小就到学社来了，都是学社培养出来的。他还说，我们这里也有许多从大学建筑系毕业后来工作的，如刘致平先生等。专门从事古建筑调查研究的机构，全国只有我们这里一处，只要你能够勤奋学习，认真的工作，将来一定会有成绩的。最后，他归纳了一句话勉励我：“业精于勤，多读书”。随后，他指给我摆在大办公室靠墙的一长排书架上的书说：你自己去找书读吧，有不懂的来问我。至于你的工作，现在你就在我这里，帮我整理一本稿子——《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然后，他又向我介绍了刘致平、莫宗江等先生。并说，你可随时向他们请教。以后刘致平、莫宗江先生在调查测绘等方面给了我很多的教导。在绘图技术上莫宗江先生给了我很多指教，后来我又帮助刘致平先生调查过四川民居，并考查过木船的结构和修造，受他的教益甚多。当时陈明达先生参加彭山崖墓的发掘，接触不多（梁思成师的教诲，已有另文，在此不复赘述）。

二、严谨治学、精心考证

敦桢师治学严谨的态度，是建筑界同行，特别是建筑史和古建筑界的同行、师友们所共知的。他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考证，不仅自己而且要求学生和后辈们都要持之有据，不要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比如对一个古建筑年代的断定或对某一建筑史上问题的评论，他总是持谨慎的态度，不急于轻易下结论，务求扎实准确。我在帮助他整理《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将近一年的工作过程中，深有体会，深受教诲。比如在他的调查报告中，有许多四川、云南等省的方形密檐式塔，其外形和内部结构都与西安小雁塔和北方唐代密檐式塔相

去不远，如果按照形式与风格推断，当属唐代。而敦桢先生在未找到文献或其他足够的根据以前，绝不轻下论断。后来经过多方考察比较和碑刻、史料的记载，发现这些方形的密檐塔果然并非唐代而是宋代的塔，并找出了形成这种塔形的历史原因和理论依据。又如对四川峨嵋飞来殿年代的断定问题，按照该殿“斗拱雄大，出檐深远屋顶坡势缓和”等等早期古建筑风格的特点来分析，应断定为宋元时期的建筑。但是当时所能得到的文献资料最早是明洪武年间的，敦桢先生经过仔细的分析之后，仍然只把它定为明初的建筑，他说这样是有根有据的。但是他也同时注意到该殿结构与造型上的特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也指出，此殿也有更早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找到足够的根据时，目前只能这样来定。如果以后有了新的证据时，再来提前也不迟。这种谨严的治学态度，受到了当时学社同仁的高度称赞，都说只要是他评定的古建筑的年代或对某些建筑史问题的论断，是比较可靠的。

敦桢先生是学社文献组的主任，因此他对历史文献特别认真。他考证问题所引用的文献资料都务求引用原文原书，力戒旁抄转录。我记得有一次他从《古今图书集成》上面得到一条资料，他就想方设法要核对原书。他说你先空着不要抄上去，先用另外的纸抄下来，等我核对好了之后再抄上去。因为《图书集成》所辑录的资料常有错误，一定要核对原书或是找到旁证，才能准确无误。那时学社的书很多未能迁到四川，查起来很费事，后来他还是从别的单位（当时迁到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馆中查到原书核对之后，才让我正式补抄上去的。这种谨严治学的态度，使我深受教益，深为敬佩。

三、严格要求，诲人不倦

我十分有幸的是初到学社就在敦桢师的直接教导下工作和学习，受益很大。我当时帮助他整理《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不仅获得了许多古建筑的知识，而且学到了许多古建筑调查研究工作的技能。当时我为他所做的工作一是抄清文稿，二是绘制小插图，三是整理照片。敦桢师说，这三件事你如果完成好了，你就算可以在学社继续工作和学习下去了。虽然要做好并不容易，但是只要你勤奋地学，用心地工

作，是能够完成的。

关于抄写文稿的事，他先拿出他已修改过的调查报告的文稿草底，让我仔细地看一遍，有没有不清楚和不懂的地方。然后说，我看过你报考时所写的字，知道你练过字的，但是我们工作所需要的字主要是工整好看，不是练那家书法。你自己写字愿意临什么碑，学什么帖都可以，但在抄写或绘图注字时一定要横平竖直，整整齐齐，清清楚楚。我试写了两次，他都不很满意，说是还不够工整，并让我按照方形的老仿宋体练。写了两页给他看，他说大体可以了，但还要下功夫，并让我用三角板打上格子横平竖直的划，这样经过多次的练习，他才认可了

绘制插图，是古建筑调查报告中的重要工作。先前是莫宗江先生为他绘了一些，后来因为宗江先生要为梁思成先生绘《营造法式》图注和“美展”（第三次全国美术展览）图，就让我来绘了。我是学着绘的，宗江先生给了许多指教。由于这本报告是普查性质，项目较多。每个建筑不能详尽分析介绍，所以图纸比较简单，以平面较多，断面较少，立面和透视图很少。但敦桢师要求也很严格，先让我用丁字尺和两块三角板练线条，然后用铅笔先画出底稿来，再用鸭咀笔上墨。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我终于初步掌握了简单的古建筑图的绘制技术。

整理照片，看起来是件很简单的工作，而敦桢师也要求很严，专门派我到宜宾市里中元纸厂门市部去选购了黑色硬纸板，按规格裁好之后，他先把照片分类，定好粘贴的位置记号，写好小纸条的说明文字，让我用白色颜料工整地书写在照片旁边。最后用粗亚麻布包面。这样的照片本子看起来也甚是美观。

我在以上三项工作中，除了学习到许多有关古建筑的知识与技能外，还从敦桢师那里学习到许多查阅文献，进行考证的基本知识与方法。由于他是学社文献组主任，加之他的国学基础、古文根底很深厚，知识渊博，使我受益匪浅。他首先对我说，你要多读书，知识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学古建筑要读古书，他说：我虽然不做诗词，但古代的诗词歌赋对古建筑的研究和考证很重要，所以我也要读它，而且很喜欢。其次他特别强调做考证文章必须重实据，要重第一手材料。材料的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古建筑本身上的题字、刻

字和古建筑内外的碑文、题刻等直接材料，二是历史书籍、文献资料和古图画等，近代的资料还有图纸照片等。文字记载一定要看原文，不要偷懒，因为转引旁抄的东西往往会有错。但他同时也十分重视字典、辞书、类书以及各种集子等工具书的作用。有一次我问他一些古建筑历史上的问题，他说你自己去查《康熙字典》、《辞源》、《辞海》，然后再查有关的《二十五史》、《通典》、《通考》、《文选》、《水经注》等等。这些书在大办公室的书架上都有，你自己去查去，后来他告诉我说：我不是不告诉你，让你去查是让你培养起查书的习惯。而且你自己几经周折查出来的东西会更记得住，在查的过程中也可以学到更多有关的知识。如果我告诉了你，你轻易知道了，你不但记不住养不成自己查书的习惯，就做不好学问。这一教诲对我来说是太重要了，使我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四、一丝不苟，廉洁奉公

我们学社在四川李庄期间，经费来源十分困难。除了业务工作人员之外，原来只请了一名会计和一名总务。这位会计年纪较大，长于世故，不久就发现他有了问题，于是不得不把他辞掉。但是谁来顶替他管账呢？再找一个，恐怕仍然和他一样，更不好办。于是这一担子就落到了敦桢师头上，我记得莫宗江先生也帮忙管过。我介绍来的那个总务，后来也出了问题，也辞掉了，一些跑腿买东西的事也落到了我头上。这样只有十来个人的机关减少了两人却也节约了不少开支。敦桢先生去重庆中大后，我记得思成先生、宗江先生也都管过账。这里要说明一下的是那时学社的账不是很多，因为所有工作人员的编制和工资都挂在中央博物院由他们那里发。但为了减少学社专业人员的负担也曾经找了一个兼职会计。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是敦桢先生在经济问题上是非常认真的，遇到问题时一丝不苟。我看到过他在查那位会计账目时，铁面无私，十分严肃，一笔一笔地查对，最后终于查出了问题，那位会计只好走路。我记得有一次他让我到镇上去购买文具纸张时，特别叮咛我说，你一定要把发票拿到保存好，拿回来好报销，我拿回的发票他都一一作了审查，无误之后才报了账。敦桢先生在管账时，公私分

明，从未沾公家分毫，就连平时在班上所用公家的东西也从不拿到家里去。

五、再度聆教，永远怀念

敦桢师虽然离开了学社去重庆中大任教，但他和我师生之间的感情仍然十分密切。1944年我随思成师去重庆工作时，我专门去沙坪坝中大建筑系拜访了他，他和刘师母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非常关心地询问了学社的工作情况和同仁们的情况。他还特别问了我古建筑学得怎么样，做了些什么工作。当我向他汇报我已经初步了解了古建筑的历史和结构特点，现在正和莫宗江先生一起，帮助思成先生绘制《营造法式》图，随刘致平先生调查民居并和卢绳先生测绘了旋螺殿时，他十分的高兴，勉励我还要刻苦学习。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调到了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敦桢师仍在南京工学院（原中央大学，现在的东南大学）任教。为了古建筑的保护维修问题，我到南京时常到学校或他家中去拜望，都得到了他和师母的热情接待与赐教。非常难得的是在新中国时期我又和恩师一起并肩“作战”参加了他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简史》。在他的领导下，这本书反复修改，直到写完第八稿，我和卢绳先生担任了宋、辽、金这一章的撰写工作。敦桢师对编写的内容、体裁以及文献资料的收集取舍、图片要求等都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这时已经是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先生已年逾花甲，我那时也是四十多的人了。但是二十多年前李庄初次受教的情景如在眼前，交相辉映。

敦桢师在建筑史研究、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和建筑教育方面的丰功伟绩是中外学界敬仰，人所共知的。与我有关的他所主编的两本书《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中国古代建筑简史》在文物保护和教学方面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与我密切相关，是我学古建筑在他教诲下的启蒙工作与学习。是在解放前夕为解放军提供文物建筑保护编写《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时的重要参考依据。《中国古代建筑简史》也已经几次重版，是建筑史教学的重点教材，也是文物古建筑工作的重要参考书籍之一。遗憾的是先生未能见到他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简史》的正式出版。《西南古建筑调查报

告》本来也该出版的，但是由于十年浩劫的灾祸，文章、插图、照片和其他许多珍贵文稿竟不知了去向。然而可喜可庆的是，“四人帮”粉碎以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指引下，给古建筑事业带来了春天。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和改革工作中，古建筑文物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建筑史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华悠久的历史文化已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支柱。现在包括叙杰同志在内的一代学人已经崛起，他们的研究成

果，古建筑保护维修工作水平大大超过了从前。中华悠久的建筑文化之花必将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不断发展，开放得更加鲜艳，宝贵的古建筑文化遗产也将保护得更好。

老师诞辰一百年，弟子也年逾古稀了，多少往事堪回首，许多教诲恩情永记不忘，老师有灵，请含笑九泉吧！

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

（上接第8页）

记得刚到中央大学执教时，某人曾对他说：“你教学生，不要连底全盘托出，应当保留一手。”但他却不以为然。

众所周知，士能与杨廷宝，童寓是几十年的知心老友。可是平时来往不多，也绝少客套应酬，大概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罢。可是他们在工作中相互支持，团结精诚，坚如磐石。我从来未发现三人发生过任何齟齬和误会，这种深厚而亲密的友谊，恐怕世间也不多见，至于对待青、中年人，士能一贯奖掖后进，对有才华者格外器重，并努力为他们创造能够施展特长的机会和条件，使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他尊重对方，自己从来不摆“万事通”和“老资格”的架子。在历次编史工作中，他接触到许多来自各单位的年轻人，其中不少才华横溢，学识过人。由于他能以平等待人，虚心听取和归纳大家意见，而不囿于门户一孔之见。这样不但推动了工作，还团结了大家，也得到了人们拥护和尊敬。现在有些外单位的同志，谈起二十多年前的这段经历时，还感到十分亲切和敬佩。

解放以后，士能在党的教育之下，进步很快。通过学习正确地认识了革命，也正确地认识了自己。1956年3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1951年起，被选为南京市和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4年，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聘为一级教授和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此外，还被选为中国建筑学会及省市分会的理事、理事长等职。1957年至1959年间，曾多次代表我国建筑界和文化界，访问了波兰、苏联、印度等国，为促进各

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了努力。

1966年，在神州大地上刮起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士能自然也是受难者，他的生命就像一支尚未点完的蜡烛被无端吹灭了。我认为最可惜的，是他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是他那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丰富学识和经验，还没来得及全部奉献给人民和祖国，而这些都是别人所能够轻易替代的。

九、结语

所幸的是士能一生的科研硕果，已由建筑研究所编辑了《刘敦桢文集》四卷（刘叙杰担任主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他倾注一生心血的事业正在发展；他热忱培养的人才，也正茁壮成长；1987年11月还举行了纪念他90诞辰的学术活动，这些都可以安慰士能在天之灵了。

古人有云：“创业艰难，守成不易”。过去我们的教师和同学，为了使建筑系跃居全国首位，不知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虽然我们今天的各方面条件，都比过去好上许多倍，但我们能不能在过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能不能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教学、科研和生产水平？能不能继承前人的艰苦奋斗和团结一致的优良作风？这一切都要靠今后全体师生的长期不懈努力了。作为建筑系蓬勃发展的目击者，自然希望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热切期待大家都能为东南大学将要到来的新飞跃，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陈敬，刘敦桢教授的夫人；

刘叙杰，刘敦桢先生之子，东南大学建筑研究所教授